

# 香港傳真

(香港) 桑尼研究有限公司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11-3

2011 年 1 月 13 日

\*\*\*\*\*

## 2010 年諾貝爾和平獎背後是地緣政治議程

威廉·恩道爾<sup>1</sup>

在一個極其微妙而敏感的時刻，挪威議會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把 2010 年諾貝爾和平獎授予了中國的劉曉波。此時此刻，美國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正在向中國政府施壓，試圖迫使人民幣大幅升值——其實這對於深陷困境的美元毫無幫助，但是對中國的經濟

---

<sup>1</sup> 顧秀林譯。作者威廉·恩道爾 (Frederick William Engdahl)，著名經濟學家、地緣政治學家，從事國際政治、經濟、世界新秩序分析研究逾 30 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學士、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比較經濟學碩士，著作：《霸權背後》、《金融海嘯》、《石油戰爭》、《糧食危機》。英文原文見恩道爾的專欄 (F. William Engdahl: “The Geopolitical Agenda behind the 2010 Nobel Peace Prize”，2010 年 10 月，[http://www.engdahl.oilgeopolitics.net/Geopolitics\\_\\_\\_Eurasia/Nobel\\_Geopolitics/nobel\\_geopolitics.html](http://www.engdahl.oilgeopolitics.net/Geopolitics___Eurasia/Nobel_Geopolitics/nobel_geopolitics.html))；中文譯文見《海峽評論》2010 年 12 月號 (<http://www.haixiainfo.com.tw/SRM/240-8036.html>)。

卻會造成危害。諾貝爾和平獎成了上演鬧劇的舞臺，這裡演出的是華盛頓反對中國的戰略大戲——不斷昇級、長期施壓的戰略行動。

把諾貝爾今年度和平獎發給劉曉波，顯然不是什麼巧合。準確地說，這是一項精心安排的長期戰略中的一個行動。這個戰略不是挪威議會部分議員的戰略，而是世界霸權——美國精英集團的戰略。這個戰略的目標，就是要阻止中國成為一個對世界經濟具有主導性的主權國家的進程。他們現在要的事，是給中國“磨掉稜角”。

在世界媒體中上演的諾貝爾和平獎鬧劇，就是這一戰略精心策劃的一個部分——竭力讓中國在世界面前“丟臉”。這是一場更深層次的博弈，華盛頓直接或間接控制的非政府組織等織成的網絡相互密切配合，把“人權”當作華盛頓地緣政治的一個武器來使用。

這一次的諾貝爾和平獎戰略不會比2008年3月的西藏暴亂更成功，不會比2009年7月中國新疆的騷亂更成功，也不會比2007年在中國鄰國緬甸的動亂（“藏紅色革命”）更成功。這幾次行動，都是華盛頓精心策劃、秘密鼓動，或者通過親達賴喇嘛集團的人發起的。參與其中的那些不成氣候的集團對此都很清楚。他們處心積慮地所做的一切，就是要製造一種國際氣候，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形象，從夥伴和“朋友”轉換成“敵人”。不過從華盛頓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風險非常高的戰略，或者是陷於地緣政治困境的美國在孤注一擲。

### 劉曉波那些不靠譜的可笑的外國朋友

英語中也有這樣一句老話：“物以類聚，人以群分”（a man is known by the company he keeps）。因為我沒有見過劉曉波本人，

也沒有讀過他的著作，所以我沒有資格談論劉曉波的為人。不過來認識一下劉曉波的那些滑稽可笑外國朋友，可能更重要。

在國際筆會網站上的正式履歷中，<sup>2</sup> 劉曉波曾是國際筆會獨立中國筆會中心的會長，他擔任此職一直到 2007 年。現在他還是該組織的理事會成員。這個國際筆會並不是某些作家們碰巧的集合，它是英美鼓吹人權和民主的非政府組織和私人組織網絡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出資人掏錢給這些組織，是要用它們來達到自己的地緣政治目標。

國際筆會自稱“世界上最早的人權組織”，成立於 1920 年代，地點在倫敦，出面的人物是英帝國的兩名地緣政治戰略家：G.B. 蕭伯納和 H.G. 威爾士。筆會的資金來源於美歐私人基金會和公司所組成網絡，其中有布盧姆伯格集團、挪威外交部和“其他不願透露姓名的贊助者”。它說它要創造一種叫做“世界文化”的東西，從這裡我們立刻嗅到了英美“全球治理”的某種氣味，這是大衛·洛克菲勒的“世界新秩序”那種氣味。

國際筆會被覆蓋在一個更大的“國際言論自由與交流”（簡稱 IFEX）的網絡中，那個 IFEX 的地點在加拿大，有大約 90 個成員，都是非政府組織，其宗旨聽起來很高尚：捍衛“表達自由權”。“國際言論自由與交流”的成員中，有一個是總部設在華盛頓的自由之家（由美國國務院資助），另一個是國家民主基金會（NED）。

自由之家是為了推動美國參加二戰而於 1941 年創建的，其後在冷戰期間，是美國情報局指揮的反共宣傳工具。這個非政府組織最近在華盛頓指揮的製造動亂的行動中卻是指揮的中心，如西

---

<sup>2</sup> 筆會美國中心(PEN America Center)網站：〈中國：劉曉波〉(<http://www.pen.org/viewmedia.php/prmMID/3029/prmID/172>)。

藏、緬甸、烏克蘭、格魯吉亞、塞爾維亞、吉爾吉斯斯坦等，一旦這些國家地區不遵循讓美國某些精英滿意的政策，自由之家就要行動了。自由之家的上一任主席是中央情報局前局長詹姆斯·伍爾西。自由之家主席包柏漪，是2008年西藏暴亂時的西藏國際委員會中的一個頭面人物。自由之家曾與喬治·索羅斯的開放社會研究所、挪威外交部緊密合作，推動了例如2005年吉爾吉斯斯坦“鬱金香革命”這樣的行動，那些項目都有華盛頓提供的經費支持。吉爾吉斯斯坦鬱金香革命的結果，是親華盛頓的獨裁者和毒梟 K.巴基耶夫上臺執政。<sup>3</sup>

國際筆會與劉曉波的聯繫暫時到此。下面看一看，諾貝爾和平獎為什麼給了他。

## 1989年天安門鮮為人知的故事

根據諾貝爾獎委員會的公告，劉曉波獲獎的主要理由，是他在1989年天安門抗議中扮演了主角，還有2008年他和別人共同起草的《零八憲章》。《時代》雜誌稱該憲章為“在受壓制的共產主義中國呼籲民主政治改革的宣言”。<sup>4</sup>

1989年春天，據說劉曉波從其任教的美國常青藤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乘飛機回到中國，在北京天安門廣場學生抗議活動中

---

<sup>3</sup> 菲力浦·希斯金 (Philip Shishkin)：〈在美國的幫助下，普京後院有了沸騰的民主〉(In Putin's Backyard, Democracy Stirs - With US Help)，《華爾街日報》2005年2月25日。

<sup>4</sup> 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 (The Nobel Peace Prize Committee)：〈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劉曉波〉( [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peace/laureates/2010/press.html](http://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peace/laureates/2010/press.html) )；《時代》雜誌的引文，見以下網址：<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2024405,00.html#ixzz12gorrikW>。

扮演了主角。對世界上的許多人來說，1989年6月的天安門廣場事件，至今還是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當年播出的那個形象。很少人知道，1989年6月的天安門廣場事件，是美國情報機構干涉中華人民共和國內部事務和實施日後所謂的“顏色革命”的最早的嘗試。後來由華盛頓操縱的類似的顏色革命，有塞爾維亞反對米洛舍維奇的革命、烏克蘭的所謂橙色革命、格魯吉亞的玫瑰革命，以及其他地緣政治性的動亂，目的都是促成有利於華盛頓的政權更迭。

正如在我的專著《霸權背後：美國全方位主導戰略》中詳細描述過的那樣，天安門事件之後，敦促當時的美國總統喬治·布什對中國政府施加強力制裁的人，是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他是布什的老朋友、中央情報局官員。如果要說李潔明是動亂的承辦人，理由是很充分的。波士頓的阿爾伯特·愛因斯坦研究所的吉恩·夏普（《非暴力戰爭》教材的作者）在天安門抗議昇級之前，恰好也在北京。據報導，夏普的組織和課本，特別是他的專著《基於平民的防禦：後軍事武器系統》，在塞爾維亞、烏克蘭和格魯吉亞的顏色革命中，都曾發揮過很重要的作用。夏普1989年6月正好在北京，這或許是巧合……也許不是。<sup>5</sup>

有消息說，1989年當天安門廣場上發生各種事件之時，一個以喬治·索羅斯為首的基金會（即“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與美國中央情報局一起參與了1989年6月天安門事件期間推翻中國

---

<sup>5</sup> 威廉·恩道爾：《霸權背後：美國全方位主導戰略》（*Full Spectrum Dominance: Totalitarian Democracy in the New World Order*），Wiesbaden 2009，第43、117頁。有關夏普和蘭德公司辦法更多情況，另見喬納森·莫厄特（Jonathan Mowat）：〈新的“驅除陰霾”在行動？〉（*The new Gladio in action?*）《網上雜誌》2005年3月19日（[http://onlinejournal.com/artman/publish/printer\\_308.shtml](http://onlinejournal.com/artman/publish/printer_308.shtml)）。

的活動，後因受到中國官方指控而被迫停止活動。<sup>6</sup>

恰巧在同一個時候，美國情報機構也積極地行動，推翻了蘇聯，回憶一下這個事實很有用。因此，劉曉波的決定——放棄他在紐約的名牌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前途遠大的學術事業，在1989年的春天，毅然投入進天安門事件的中心，極有可能至少得到過他那些很不對頭的美國朋友們的慫恿。

劉曉波在起草《零八憲章》扮演的角色，他選擇的時間，也很令人好奇。當中國在對它的經濟進行現代化時、當中國允許在筆者看來比許多西方所謂的民主國家更多個人自由的時候，劉曉波提高了他的政治批評的調子。2008年，他相當清楚地知道，中國官方對西藏和新疆可能發生的動亂活動極其敏感；這關係到在奧運會期間使北京丟面子。美國國務院承認，2008年由達賴喇嘛所支持的西藏抗議和暴亂，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嚴重的內部動亂。如果認真嚴肅對待這樣的事情，那麼這個時刻就不是更多要求放開不同政見的時機。它暗示，劉曉波的行動也許出自另一個更深的計劃，而那個計劃是他那些很不對頭的外國朋友提出來的。

## 諾貝爾獎提名

在這種情況下，是誰正式提名劉曉波為2010年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就很值得注意了——提名人竟然是達賴喇嘛！他自己通過國家民主基金會，長期接受美國政府中央情報局和國會的大筆金錢。達賴喇嘛提名劉曉波這個事實，足以說明今年諾貝爾和平獎的本質——地緣政治。

---

<sup>6</sup> 合眾國際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據報導領中國經費的雇員受審〉(China Fund employee reportedly interrogated)，1989年8月9日。

如果我們再關注一下提名劉曉波的其他人，那名單讀起來就像大衛·洛克菲勒那個極為秘密的三邊委員會的國際會員名單。那個三邊委員會是由超級精英組成、有邀請才能入會的一個團體，由北美洲、歐洲和日本的 300 個強勢人物所組成。中國未被邀請參加這個嚴格挑選會員的俱樂部。

除了達賴喇嘛，提名劉曉波的人中，還有捷克外交部長和親王卡雷爾·施瓦岑貝格、世界貿易組織前主管邁克·穆爾、俄國反對自由市場政客 G.A.葉林斯基。

卡雷爾親王、穆爾和葉林斯基——他們也都是精英組成的三邊委員會的成員；我們從這裡得到了什麼暗示？他們有計劃地把諾貝爾和平獎送劉曉波。

支持北約的捷克前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是喬治·索羅斯贊助的人權觀察組織國際委員會主席。他也參加了劉曉波獲獎的提名。哈維爾是卡雷爾親王的親密朋友，他注意到，劉曉波的《零八憲章》是捷克《七七憲章》的翻版。該憲章曾得到美國的暗中支持，在推翻 1980 年代的蘇聯時派上了用場。<sup>7</sup> 這一切都在暗示，這是一個結合緊密的哈維爾俱樂部，其會費是由華盛頓來支付的。

有關挪威議會諾貝爾委員會的情況很少被公佈過。他們的網站強調，他們是完全獨立的，但是如果看一看獲獎者名單，這話就不那麼可信了。那個名單包括達賴喇嘛、昂山素季（緬甸被監禁的反對派領導人）、巴拉克·奧巴馬（執政僅兩週時獲獎，而在他獲得提名之前，他在阿富汗戰爭的軍事集結非常顯而易見），

---

<sup>7</sup> 瓦茨拉夫·哈維爾 (Vaclav Havel) 等：〈和平和自由的中國捍衛者〉(A Chinese Champion of Peace and Freedom)，2010 年 1 月 18 日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havel38/English>)。

以及亨利·基辛格（1970年代任美國國務卿，支持拉丁美洲獨裁者鎮壓成性的隨意殺戮平民的政權）。當然，當華爾街銀行和英美權勢集團決定藉全球性變暖而加緊行騙的時候，諾貝爾和平獎就授予了聲名狼藉的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IPCC）和全球性變暖鼓吹者戈爾。只要把事實公開，證據是確鑿無疑的：諾貝爾和平獎是北約集團的一個地緣政治工具，向不和它一心一意的某些政府施加壓力。挪威是北約的一個創始成員國，並且與美國的領導集團有著極為密切的聯繫。

### 更加深刻的地緣政治意義

美國強勢集團為什麼選擇這個時刻通過授予劉曉波和平獎來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施加更大的壓力？這個問題可以明顯地見之於中國近來成為強大、充滿活力、不斷成長的世界經濟體而同時美國跌入其兩百多年歷史中最嚴重的經濟蕭條這一事實。

美國官方戰略政策仍然是2002年9月《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裡所詳盡闡述的內容，有時又被稱為“布什主義”，稱“冷戰後時代美國的政治和軍事任務將是保證不允許超級大國對手在西歐、亞洲或者前蘇聯的領土上出現”。這種方案的制定一直是1992年以來五角大樓明確奉行的金科玉律。<sup>8</sup>

為什麼中國被盯上了？這只是因為中國今天作為在經濟和政治上一個不斷崛起的世界因素，與外國進行聯盟，用以支持在蘇丹或伊朗這些華盛頓控制較少的地方的這種發展勢頭。在這點上，

---

<sup>8</sup> 派翠克·E·泰勒（Patrick E. Tyler）：〈美國戰略計劃呼籲阻礙對手的發展：一個單一超級大國的世界〉（U.S. Strategy Plan Calls for Insuring No Rivals Develop: A One-Superpower World），《紐約時報》1992年3月8日。



中國作為一個積極穩定國家的存在，對於美國來說是一個不斷成長的戰略威脅，並不是因為中國威脅華盛頓在全球發起的戰爭。真正的威脅是，當中國、俄國、中亞的上海合作組織國家以及不計其數的其他國家走向一個更加多樣化的多極世界的時候，美國和那些遵從其戰略的國家失去全球性霸權地位。根據布什主義和美國戰略地緣政治學，趁現在還來得及的時候，必須不惜一切代價防止那種事態的進一步發展。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在美國強大的壓力下最近逐步加大對伊朗的制裁，與其說是與伊朗及其核野心有關，還不如說是與伊朗是中國的一個戰略經濟夥伴這一事實有關。

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劉曉波，離開一個促進和平的姿態很遠。此事最好從它的真實情況來看：這是一個被美國引導的、非政府組織孵育的、反對中國主權的、非正規戰爭宣言的一部分。英國兩百多年的均勢地緣政治學中，有一條這樣的公理，即霸權帝國必須時刻尋找兩個潛在敵人之中較弱小的一個，然後與之聯合，攻破強者。美國從2001年以來對印度的政策、2008年以來對中國的政策，恰恰如此，即尋求與弱小但更有用的印度結盟，結為軍事和戰略聯盟，對抗中國在亞洲特別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戰略利益。

北約在阿富汗（遠離北約的北大西洋地區）的正式存在，應該發出的是這樣的信號，即所有這一切並不是為了促進民主或表達自由，而是一個不斷式微的霸權孤注一擲地試用它武庫裡的一切武器，來扭轉現實。劉曉波只是他們這一努力的一個順手的工具而已，是無數工具之一，就像達賴喇嘛或華盛頓支持的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的熱比婭·卡德爾一樣。值此美國的可信度與它的經濟穩定同時急劇惡化之際，他們這樣幹大概是無濟於事的。

## 劉曉波代表戰爭而非和平

香港科技大學 沙伯力

香港理工大學 嚴海蓉<sup>9</sup>

2010 年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幾乎沒有收到來自非洲國家的祝賀。無論各國不祝賀是出於何種動機，劉曉波的確不值得祝賀，因為他的觀點和目標有悖於大多數中國人的利益。

人們從國際媒體上所能瞭解到的劉曉波，是一個民主鬥士。

但事實並非如此。而且，即使他真是這樣的鬥士，他為中國開出的處方也是行不通的。

首先，一個人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的先決條件，應該是他支持和平。劉曉波則恰恰相反。

他用熱情洋溢的言辭支持戰爭，包括支持美國侵略和佔領阿富汗和伊拉克，以及在此之前美國發動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

諾貝爾獎評審委員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即劉曉波支持那些聯合國拒絕授權的戰爭。然而，這種忽略並不讓人感到意外。

評審委員會成員所代表的是挪威議會的主要政黨。

姑且不論為什麼全世界應該去信任由同一國家的五位白人政客授予的獎項，人們應該看到這樣一個事實：這幾位政客所屬的政黨支持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因此挪威向這些國家派軍。

---

<sup>9</sup> Barry Sautman, Yan Hairong: “Liu Xiaobo stands for war, not peace”, 2010 年 10 月 25 日 (<http://www.mg.co.za/article/2010-10-25-liu-xiaobo-stands-for-war-not-peace>) ; 中文譯文經嚴海蓉校閱。

其次，1988年劉曉波在接受香港一家雜誌採訪時談到，中國應該經歷三百年的殖民統治，以使自己像香港一樣。2006年他接受同一家雜誌採訪時，重申了這個觀點。

考慮到在殖民統治下，人權遭受到嚴重侵犯，這種論述既不可能在中國，也不可能在大多數前殖民地，受到民衆歡迎。

第三，導致劉曉波被捕的《零八憲章》，鼓吹在中國進行工業及土地私有化。

蘇聯的私有化，曾導致整個經濟的核心領域成為少數寡頭的囊中之物。

而且，中國部分已經私有化的國有資產，主要是“肥”了官員，因此，在民意調查中，大多數中國民衆表示反對劉曉波主張的這種全面私有化。

其四，長期接受美國民主基金會資助的劉曉波，提出中國應儘快轉型為選舉民主，以此來解決中國面臨的種種問題。

但這根本不能保證解決中國的問題。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帕倫勃（Randall Peerenboom）的研究顯示，部分“非民主”國家，例如新加坡和一些阿拉伯國家，法治程度反而較高；而實行選舉民主的國家，如危地馬拉、肯尼亞、巴布亞新幾內亞，法治程度很差。

在富裕程度低的階段就實行選舉民主轉型的國家，<sup>10</sup> 往往發展程度低，而且局勢動盪。

只有處於發展中國家高端位置的幾個小國家，可以維持選舉民主。印度是一個例外，但在經濟和社會的多個方面，它比不上中國。

---

<sup>10</sup> 中國目前仍然是不折不扣的發展中國家。

印度也有一個問題叢生的政治體系。帕倫勃發現，“那些以為中國大眾在看到亞洲國家的經歷之後、仍然渴求以選舉作為解決問題的方案的人，應該三思。……選舉……幾乎不能激發信心，也很難落實被誇大了的、關於民主可以保持政府官員稱職的說辭。”

研究也顯示，只有“最高程度的民主”才可以改善人權狀況。在很多案例中，發展中國家向選舉民主的轉型過程，讓情況變得更壞。

如果大多數中國人瞭解了劉曉波的主張，他們會拒絕他。

對付劉曉波的更好的辦法是讓整個世界都看清他的主張。那樣的話，世界上的大多數人，就會像非洲國家那樣，將根本不會向劉曉波表示祝賀。

## 劉曉波問題的多元思考

劉迺強<sup>11</sup>

我本來是不想談劉曉波的。我不想談，因為這題目太複雜，分屬不同層次，這裡也只能簡單的分析一下。但看到香港一犬吠形、百犬吠聲的言論：據西方統計，香港在這題目的評論文章共超過五百篇，但批評劉曉波和諾貝爾獎的只有十篇左右；並大都集中於《文匯》和《大公》；《南華早報》發表了一篇由華洋學者合著的文章批評劉曉波崇洋，不適合中國國情，馬上被圍毆個半死。劉曉波這題目還繼續發酵，並肯定作為中學通識教育的教

---

<sup>11</sup> 本文原刊於香港《信報》2010年11月2日，第18頁。作者再做修改。

材，在如此惡劣的一面倒輿論環境中，學生哪有素材作多元思考，哪有能力做“批判思維”？被人偏向引導，牽著鼻子走而不自知。

作為一個人，我曾經敬劉曉波是一條漢子。他是當年“六四”的四君子之一，促成了學生和平撤出天安門廣場，免了一場血光之災，客觀上也幫了共產黨一個大忙，今天連“支聯會”和“教協”都已經不敢再說它“屠城”。更可敬的是他們四人後來因此被抓，出獄之後還直言廣場中的學生是全部和平撤退，不跟海外異見分子一起撒謊，否則自己還活得好好的，就解釋不清了。

在思想上，劉曉波是不折不扣的“全盤西化”論者，名句有：“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樣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對此，他至今還堅信。在香港，我相信除了極少數人之外，能對此有共鳴者恐怕不多，內地則普遍會引起很大的反感。跟香港一些年青人一樣，劉曉波沒有經歷過殖民統治，所以一廂情願的美化殖民主義。

但以一般香港人的價值，李柱銘自認“天天當漢奸”，也不能因言論入罪。我雖然未必同意要對劉曉波以言入罪，但我想指出，這並非全世界通用的“普世價值”。幾年前，德國有學者以大量事實嘗試證明二戰時沒有 holocaust(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這回事，馬上被抓。作為歐盟核心成員，德國的人權觀念理應比中國和美國更強，尚且如此，可見言論自由並非一概而論地毫無限制的。

我可以肯定，今天噶噶噶地支持劉曉波的人，許多都沒有看過他的《零八憲章》，西方也很有默契地對他這得意傑作刻意不提。憲法專家宋小莊兄指出：《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有規定，言論自由不得破壞他人權利和名譽，不得危害國家安全、

公共秩序、公共衛生或風化，不得鼓吹戰爭，不得鼓吹民族、種族或宗教仇恨，不得煽動歧視或敵視等等。對於劉曉波光於《零八憲章》中大量違憲違法，甚至背離事實的言論和串連行動等，在許多西方民主國家也要坐牢的。

我最近對一個外國朋友說，如果美國有一個國民發起聯署，鼓吹美國放棄聯邦制，搞單一體制；放棄普選，搞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制，搞社會主義。共有幾千人聯署，當中包括幾百名古巴、北韓、越南和中國人，還有幾個中國人大代表之類的政治人物，你看他的下場會怎樣？他想也不想就說：“他肯定要坐牢了。”

我們可不用太為劉曉波擔心，因為他已經是個中年人，十分成熟，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事，和有什麼後果。他是豁了出去，坐牢是他意料中事，也是他願意付出的代價。只是香港有不少人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什麼，卻裝知道；更有一小撮完全知道自己做什麼，卻裝作不知去哄人。這才是問題，值得我們思考和擔心。

另一個層次是諾貝爾和平獎。這個獎向來都十分“騎呢”（猥瑣）和搞笑。據小莊兄的考據：奧巴馬在就職美國總統後第 11 天就獲得提名，當時伊拉克戰爭尚未結束，連奧巴馬都說自己不配拿此獎。這個得獎者一方面提倡全球廢核，自己卻於 2010 年 9 月偷偷搞核試，被揭發了才被逼承認。發動二戰的希特勒曾獲提名，而結束二戰的美蘇中英法領導人都沒有一人獲獎。印度聖雄甘地，是組織非暴力運動、使印度脫離英國殖民地獨立的領導者，曾五次獲提名，卻始終與和平獎無緣。1973 年美國基辛格、越南黎德壽得獎，但黎因抗議當時戰火仍在蔓延而拒絕領獎。1994 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領導人在戰爭狀態繼續的情況下同時獲獎，但迄今以巴尚未有真正的和平。海外和香港一些人把這國際搞笑獎裝扮得神聖不可侵犯，正好是明懂裝不懂的例子。他們把劉曉波

大事炒作一番，只是各有自己的議題，對劉曉波甚至他追求的“理想”一無幫助。

諾貝爾和平獎之如此荒謬，是它從來都沒有脫離西方中心的傲慢與偏見，有些評審者，會企圖藉此作為他們的政治宣言，甚至作為他們改變某些現狀的政治手段。傲慢與偏見的背後是無知，這才會毫無根據地的把 60 年前的西藏農奴社會香格里拉化，和把達賴這反口覆舌的政治喇嘛神聖化，並藉此把中國妖魔化；頒個和平獎給達賴，想給中國施壓力，改變達賴在中國的地位和處境，以及西藏的未來。今年劉曉波得獎亦如是。

對於西方這個遊戲，中國已經被玩了幾次，也吃了不少虧，卻仍然沒有學乖，事前還神經兮兮的向挪威作外交照會，今天則在蹦蹦跳。人家就是沖著你中國來，見你氣只會更樂。我們不妨易地而處，今天西方經濟整體衰退，並且不知會衰到哪天，退到哪裡。國民叫苦連天，上百萬人的暴力示威此起彼落，並且有人開始懷疑西方過去走的路線是否正確，是否還要走下去。在這樣的環境底下，毋須什麼陰謀理論，也會有些人要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證明西方的體制和價值觀是好東西，別樹一幟卻欣欣向榮的中國模式是壞東西，不然的話，他們是會神經崩潰的。跟著他們尾巴，久而不聞其臭的少數香港人，他們也需要證明自己跟得對，聞得香，還要有所表現。這些人今天的動作是最自然不過的，不這樣反應才怪。

問題在於，我們中國人中間有多少人清楚我們在做什麼？該做什麼？為什麼這樣做？我們大多數專家學者，對於西方模式壞在那裡，為何不適宜嫁接到中國，都說不出個所以然，更不論正面闡述中國模式，和如何把這模式落實和完善了。

所以，什麼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人家在外邊怎麼鬧，其

實都是虛的。我們只需要把自己的道理講清楚，尤其是對香港的廣大同胞講清楚，免其因為無知而受到蠱惑；其他虛招，虛應便是，大力做好自己才是根本。

但是今天五百對十的一面倒，一般香港市民想像中學通識教育所要求的從不同的來源接收不同的訊息，從不同的角度思考問題，都根本不可能。之所以如此，中央固然有責任，而在一個公認訊息自由、言論自由的社會，港人自以為知道天下事，其實卻十分無知，這簡直是另外一種愚民政策。我們竟然淪落如斯，也應該自我反省了。